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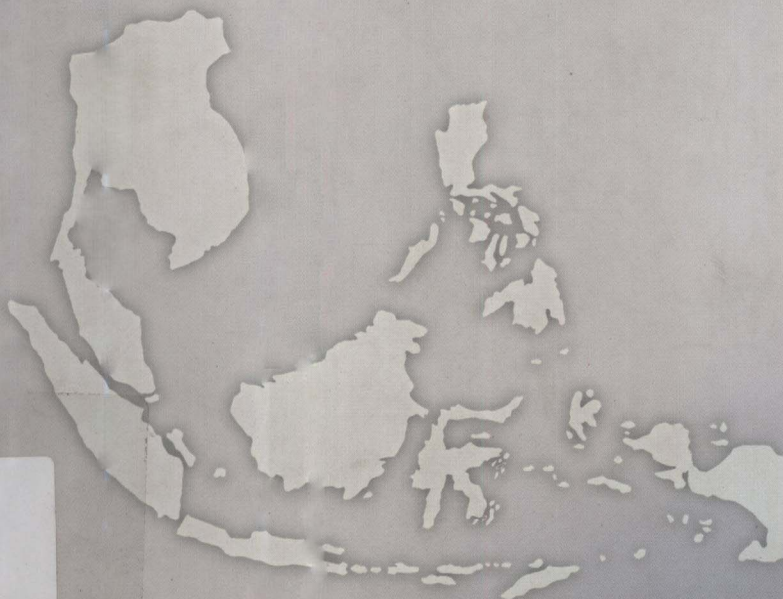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之五

教育与认同：

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

古鸿廷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之五

教育与认同： 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 (1945-2000)

古鸿廷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古鸿廷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6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5.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庄国土主编)

ISBN 7-5615-2065-4

I. 教… II. 古… III. 中文-中学教育-研究-马来西亚-1945~2000 IV. G639.3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385 号

责任编辑:薛鹏志

封面设计:文 心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新市南路 166 号 邮编:365001)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875 插页:2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重大课题
“东南亚华人经济、政治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庄国土

副主编:廖少廉 王 勤 聂德宁(常务)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勤 古小松 古鸿廷 包乐史

刘 宏 庄国土 李国梁 李金明

吴崇伯 余定邦 汪新生 张锡镇

陈福郎 林 梅 周 宁 周聿峨

段立生 侯真平 贺圣达 聂德宁

高伟浓 郭志超 黄良文 梁志明

蒋细定 曾华群 廖大珂 廖少廉

薛学了 戴可来

自序

马来亚地区为数众多的华族,一向为研究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对象,对华族文化具深厚影响力的华文教育,更为探讨本地区社会与文化演变的必要课程。马来亚地区在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下,对华文教育的态度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由放任转向监控。殖民地政府的施政措施以维护政局稳定与经济繁荣为鹄的,政府对华人教育多半采取消极的防范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亚地区以马来人为主的新兴土著民族主义指责华文教育为“大汉沙文主义”的具体表现而加以压制,然而华文学校在此段时期内仍旧生存。

由于海外华侨问题包括范围甚广,以往多以研究20世纪以来新马地区华侨的华文教育及政治活动为主,已完成有关新马地区华侨认同问题之专书一本即《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1994年6月)。在国科会的资助下,有关马来亚华文教育之探讨,已成为一长期研究计划。过去数年已先后完成《战后马来亚地区华文教育之研究》、《英属马来亚联合邦华文教育之研究》、《马来亚联合邦自治后华文教育之研究》、《西马地区华文独立中学之研究》、《东马来西亚地区华文独立中学之研究》等五篇有关马来亚地区华文教育与文化、政治认同为主之研究,同时选定4所具代表性之华文独立中学做个案研究。第一所为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由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后再复办独中业务的中华独立中学。第二所为战后位于麻坡地区由中华学校及化

南学校合并发展而成的中化中学。第三所为马来亚第一所宣布不愿改制,成为今日学生人数最多、位于柔佛新山的宽柔中学。第四所则为一所华文女子中学——坤成女中。

蒙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庄国土教授之鼓励,本人将以往相关研究论文加以修订与补充,合成一本有关马来亚政治与文化认同的专书,书名定为《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

由于本书中之多篇论文,先后发表于国内外之学术期刊或国际学术研讨会,皆各自独立成篇,各篇中之背景部分及对马来亚地区华文教育之观点难免有重复之处,为便读者作单篇之阅读,故未全删。其中,《吉隆坡之中华独立中学》及《东马地区之华文独立中学》由本人与张晓威共同撰写,特此声明。在撰写期间,先后蒙朱浚源、林水椽、庄国土、陈鸿瑜、张震东、许达然、黄建淳、郑良树诸教授之鼓励及指正,国科会及海华文教基金会之支持,助理许择昌、张晓威、曹淑瑶、陈丁辉,马来西亚董总、教总,新山宽柔中学、麻坡中化中学、吉隆坡坤成女中、吉隆坡中华独中、诗巫公教中学、古晋中华第四中学、美里廉律中学及泗里奎国立中学等学校之协助,特此致谢。文中所有错误将由本人负责。由于有关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涉及范围甚大,资料收集及立论皆难免有缺失之处,仍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作日后再版时之重要参考。

古鸿廷 谨识

2002年12月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导 言

居住于海外,人数众多的华族,一直是受人注意的对象。二次大战后,由于各国之民族运动澎湃,以及独立之后建国意识之迫切,华侨、华人、华裔的国家意识与政治认同,更成了非常敏感的问题。我国对华侨的政策,以及这些华族对所在国的立场,仍为许多学者与政治决策人所密切关注。

由于我国为一地处东亚的陆权国家,在历史上,除极少时期外,政府多半禁止人民前往海外。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在亚、非地区的积极殖民,以及美国西部的开发,极需外来移民的人力资源。而清廷在英法联军之役后,被迫放弃以往的海禁政策,致使在1860年以后,我国向外移民的人数大增。20世纪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以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海外华侨社区积极活动,争取侨胞的支持与参与,他们的活动,引起激烈的回响。海外华人文化与政治意识因而急速升起与成长。这种以中国为导向的意识,引起华族侨居地政府的猜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地的土著主义兴起,更引发不少排华事件。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该族群所受之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华文教育的兴起自然与马来亚地区之华侨、华人的政治认同的出现与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关联。然而,文化传承与政治意识的出现、塑造及发展之间之紧密关联是否有必然性,值得商榷。马来亚地区华侨、华人的各种文化与政治活动,以及推动这些活动的意识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尤其需要吾人作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能从本地区

之华文教育之发展与马来亚地区华侨及华人的政治意识的滋生与成长之历史关系中,寻找出二者中偶然及必然的因素。进而有助于吾人消除由国际政局的变化对我国海外华侨、华人所产生的误解,同时在学术上提供对海外华侨、华人之政治与文化认同更周全的分析与了解。

母语的保存与发展,与母语教育有密切关系,而母语教育又与其存在的客观环境有密切关系。移民海外的华人,承继华族的传统,对子女的教育甚为重视,为数众多的华族移民及其后裔,在马来亚地区先后设立许多华文中、小学,教育其子女。华校创立之初,经费泰半自筹。1920 年以降,英殖民地政府为管制华校,制订许多法令条例,监控华校之运作,同时设立政府津贴制度,企图“利诱”华校依据其蓝图而发展。然而,一方面由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华族海外民族主义之发达,对其文化资产甚为重视,另一方面亦因当时居住于马来亚地区之华侨及华人,泰半为第一代移民,对殖民地之政治不能亦不甚感兴趣而少参与,华文教育因而持续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占领马来亚时之种种压迫措施,在战后初期更激发本地区华族海外民族主义运动者积极倡导华文教育。1959 年位于新加坡之南洋大学的设立,提供马来亚地区华族子弟从小学到大学一套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然而,正当华族庆幸其一套完整华文教育的完成时,新兴的土著民族主义运动者,掌握撤退中英殖民地政策之怀柔政策的演变,获得马来亚地区以英、巫双语为官方语文的承诺。在马来亚独立建国之际,在华族族群中因教育背景不同,出身英、华文教育源流的两派无法对加列华语文为马来亚地区之官方语文之观点采取一致行动,导致巫语文独大现象的出现。巫语在马来族群主政下,不但成为“国语”,且欲成为全马独尊的文化语文,意图以语文之统一,消除境内其他族群之文化传承,借由“同化”而凝聚全马为一坚强的政治实体,成为一个以马来语言、文化为主流的“民族国

家”。

许多闽粤地区之华族,迁往马来亚之初,原本以寻求更佳经济生活为鹄的。其中泰半以勤劳节俭期冀累积财富后可衣锦还乡,然而诸多主、客观条件,致许多原本只计划“寄居”于马来亚地区的,成为“定居”于马来亚。许多原本对当地政治参与采冷漠心态者,因二次大战前后之华族海外民族主义的急速发展而逐渐改变其初衷。这批原本来自闽粤地区,虽或因本身知识贫乏,或因专注经济生活,或因出身保守社会,而不敢或不愿涉及政治活动者,却深受中国社会重视子弟教育的观念所影响,而设立许多华文学校培养其子弟,盼望下一代有更好的前途。但其重视华文教育之思想与行动,却受到新兴之土著民族主义运动者,以“大汉沙文主义”而加以指责与压制。马来土著对华文教育的排斥自然引发历经二次大战时抗日活动的华族之不满,因华族除自认其历史文化不亚于土著之文化传承外,亦自认在马来亚独立建国之时曾尽“国民”一分子的努力。在马来亚独立后,有享受母语教育之权利,且认为语文为一人际交往之工具,可透过华文教育而培养出热爱马来亚的公民,对中华文化之热爱并不减低其在政治上效忠于马来亚的热诚。

长期主政之马来族群,或因缺乏自信,不愿放手让全马来亚社会中之各族群自由竞争,或受误导而以为华族拥有巨大财富为经济剥削者,而企图透过政治力量重新分配社会及经济资源,或因无知自负而迷信其文化与宗教之优越,而亟欲同化其他族群,或因其华族之文化认同与其政治意识的成长,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密切关联,而忧心华文教育的存在与发展对塑造马来亚为一国家的建国过程造成障碍。巫、华两族群对文化传承及母语教育与政治效忠间不同的解读,在马来亚独立之后曾引发多次族群冲突。每临国会大选,华文教育的存废与发展,常成为政治斗争的热门话题。在建立马来亚为一马来文化为主流与接受马来亚为一多元文化、多

元族群国家的两端中挣扎,为维护马来土著特权,在经济上固然采用许多有利于土著的措施,在教育上除以国家财政支持巫语教育外,在高等教育上采族群入学学额分配制度,限制华族子弟在公立大专院校就读的机会。此种对华族子弟进入高等学府的“固打”制度除迫使不少学子负笈海外就读外,亦与其强调马来文化优越的主张产生矛盾,尤有进者,在依族群立场而排挤其他族群时,会使其他族群对国家建构产生疏离感,有碍于建立一个族群融和的社会。

母语教育的出现与发展,对培养一个族群之文化遗产与历史意识的塑造具有重大意义。缺乏文化遗产之族群并不意味着其必然接受另一“强加”其身之异体文化。此种强制的政策,可能产生短暂的效果,但许多时候,反而造成非理性的对立与冲突。此种冲突带来之伤痕非常不易愈合,易于成为将来冲突的潜在危机,尤其易因少数民族意识强烈的人的挑动而爆发冲突。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形成类似,在其形成过程中并非纯出于理性的选择。文化认同因与日常生活较密切,透过教育可产生远较政治认同坚固的结合。许多时候有心人士常以文化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后盾,借其强化人民之政治认同,企图建立一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重叠性较强的国家。然而文化认同毕竟与政治认同不同,文化认同之形成与日常生活挂钩深,一旦塑造成功,非经长久摧残殆尽,可在适当时机吸引注意而死灰复燃。

马来亚地区华人社会因方言不同而形成的多元区域文化,因华语(早期称为国语)运动以及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发达而塑造成所谓“马华文化”。此种因政治认同发达而促进的文化认同,似提供马来族群拟以政治力量将华族文化融入其马来文化而塑造成“马来亚文化”的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以前,马来亚地区华族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触发的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可说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偶然结合。随着时空的转换与主客观环境的

目 录

自序	(1)
导言	(1)
战后马来亚地区之华文教育	(1)
英属马来亚联合邦之华文教育	(29)
马来亚联合邦自治后之华文中学教育	(57)
西马地区之华文独立中学	(90)
东马地区之华文独立中学	(123)
吉隆坡之中华独立中学	(150)
柔佛之宽柔中学	(193)
麻坡之中化中学	(221)
吉隆坡之坤成女中	(255)
征引书目	(285)
古鸿廷相关著述	(299)

战后马来亚地区之华文教育*

一、前言

马来亚地区为数众多的华族,一向为研究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对象;对华族文化具深厚影响力的华文教育,更为探讨本地区社会与文化演变的必要课题。二次大战以前,马来亚地区在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下,对华文教育的态度,逐渐由放任转向监控,但可能由于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主要目的为经济上的剥削,政府的施政措施以维护政局稳定与经济繁荣为鹄的,只要殖民地居民的各项活动不损及上述两目标,政府多半采取消极的防范政策,华文教育即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兴起与发展的。二次大战后,马来亚地区以马来人为主的新兴土著民族主义指责华文教育为“大汉沙文主义”的具体表现,甚至以东西方冷战立场,认为华文教育为“培养共产党徒的温床”^{〔1〕}而加以压制;华文教育支持者则

* 本文初稿刊载于《东南亚季刊》,第3卷,第2期,1998年4月,第53~73页。

〔1〕 马来亚联合邦联提学司威菲氏(L. D. Whitfield)于1951年之教育年报指控“华人热心办学,仍是本邦面对的危险”。1954年兼代教育部长后,更公开宣称,“如多教英文少教中文,共产思想难在华文中学滋长,亦可避免共产党分子之潜入”。当时之剪报,见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年,第130~131页。

以种族主义偏见驳斥马来民族主义运动者。由于一项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泰半有其历史轨迹可循,本文拟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新马两地分别于1959年及1957年获得自治为止,探讨华文学校于此段时期内在英属马来亚地区之发展过程、存在意义及其展望。

二、背景

英属马来亚殖民地政府^[1]对马来亚地区着重于政治的监督与经济的开发,为巩固其殖民控制,设立一些英文学校,培养当地精英,协助其统治。对当地之巫人、华人及淡米尔人之教育发展,起初一向采取自由与放任态度,不加干涉。早期移居马来亚地区的华人,文盲甚多,由于人数少,经济力量薄弱,除少数私塾外,并未设立新式学校。20世纪以后,一方面因人口大增,^[2]华族社区的财力也渐累积;另一方面,革命、保皇两派的各项政治与文化的活动,加上清廷也一再派员南巡,并设立领事馆,促进侨社之文化

[1] 当时之英属马来亚包括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及马来属邦等三个部分。大英帝国在海峡殖民地设置总督,直接管辖新加坡、马六甲及槟榔屿,在马来联邦之各州设立参政司(Resident),在马来属邦各州则派顾问官(Advisor),并在吉隆坡任命总参政司(Resident general),总参政司向驻马钦差大臣(High Commissioner)负责。总督及驻马钦差大臣同为一人,但在行政组织上有两个殖民地政府,一般皆通称为英属马来亚殖民地政府。

[2] 1901年新加坡之华人人口为164 041人,1921年增加到276 608人,1930年为353 690人,1941年则为599 659人。马来亚半岛(包括槟榔屿及马六甲)之华人人口在1911年为558 918人,1934年增至1 183 334人。见王赓武著、张奕善译:《南洋华人简史》,台北,水牛,1969年,第134~136页。

与教育发展,新式学校遂先后在海峡殖民地及其他马来亚地区设立。^{〔1〕} 英殖民地政府对此日益发达的华文教育虽未加以奖助,但也未加干涉,而任其自由发展。^{〔2〕}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马来亚地区曾引起相当的响应。^{〔3〕} 此后,深具民族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前往马来亚设立学校或担任教师。为防范华文学校的各种政治活动,英殖民地政府于1920年颁布各项教育法令,对华文教育加以规范。此后,英殖民地政府逐渐加紧对华文学校的控制,先后制定各项法令。^{〔4〕}

依1920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所颁布的《华校注册法令》,所有在马来亚地区拥有十名或十名以上学生的华文学校皆须向当局呈请注册,而政府当局得随时宣布何所学校为非法,并将其注册取

〔1〕 有关清季革命党、保皇党以及清廷在此地之活动,参看崔贵强:《晚清官吏访问新加坡》,《南洋学报》,卷29,1974;刘世昌:《中山先生与南洋》,李国雄:《南洋华侨与民族主义之发展(1895—1911)》,《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6年。

〔2〕 有关二次大战前马来亚地区华文教育之发展,可参阅郑良树:《新马战前的华文教育》,载郑良树:《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卷二),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第90~179页。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采取放任态度的理由,郑明泮认为是殖民地政府将本地区华人视作外国居民,政府没有义务去承担教育的责任,只好让其自由发展建立其教育体系。参阅 Paul Chang Ming Phung,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Plural Society-A Malaysian Case Study*, Kuala Lumpur,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973, pp. 9~28.

〔3〕 崔贵强:《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响》,《南洋学报》,卷20,1966年。

〔4〕 有关《学校注册法令》对中文学校的冲击及其重要规定,参阅许苏吾:《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50年,第131~143页。

消。注册法令实施后,立刻有超过 10 间华文学校被取消注册。^{〔1〕} 1926 年之《学校注册法令》更进一步规定,所有学校均须注册,在未注册学校充当监理员或董事或教员,即视为违法,^{〔2〕}当中并明白指出“如提学司发见学校有不合卫生之处,或学校将用为宣传政治学说之机关,而有妨碍殖民地地方上,或公众之利益;或学校所教授之学科,将损害学生利益;或学校将用为不法会党之集合地点;此等学校除能将其校舍改善,期合于卫生,或愿缴纳保证金,该校不用作上述不合法宣传及损害学生利益之机关,或非法会党之集合地点,获得提学司之满意外,提学司得拒绝发给注册凭照”。^{〔3〕} 该注册法令之第 18 条更明白规定,如发现某校系用为宣传政治学说之机关,其存在有妨碍殖民地地方上或公益上之利益,或教授方面有损学生之利益;或用为不合法会党之集合地点者;得列举其不法情事,限该校负责人于指定日期内,“陈明不应将该校宣布为违法学校之理由”。^{〔4〕}

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之监控,确在某些程度上,限制华校的各种政治活动,减少“效忠中国”政治意识的成长。1920 年,殖民地政府为吸引华文学校对殖民地教育政策的支持,除加强监督外,更宣布“津贴”制度,对符合教育法令,愿意配合教育政策的华文学校加以补助。殖民地政府宣布,只要这些华文学校接受政府对

〔1〕 许苏吾:《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第 131~132 页。《华侨志——马来亚》,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 年,第 185 页。

〔2〕 1926 年《学校注册法令》第五条,见许苏吾:《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第 134 页。

〔3〕 1926 年《学校注册法令》第八条,见许苏吾:《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第 135 页。

〔4〕 1926 年《学校注册法令》第十八条,见许苏吾:《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第 138 页。

其课程及教科书之监督,就给予财政上的资助。^[1]但因当时绝大部分的华文学校,既有来自中国的经费补助,又有当地华族社区财力上的支持,故多未接受殖民地政府有附加条件的资助。^[2]

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对输出橡胶、铁等原料的英属马来亚产生巨大冲击,为减少殖民地劳力供应市场的压力,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移入英属马来亚地区的人数加以限制。这项对移民限制之法令,日趋严格。位于新加坡之海峡殖民地议会明白表示,其所订之外侨管制条例,旨在授权殖民地之行政机关,控制移民之品质及禁止“不受欢迎的人士”进入马来亚地区。^[3]这项限制移民的措施,事实上是以华人为主要对象,因此,迅速减少了华人移入英属马来亚的数量,间接地也就减少了华校学生的入学人数,以及华人学校从华人社区获得的财力支持。此时,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不但剥夺了华文学校来自中国的经费支持,^[4]自然也大量减少了以往以生产橡胶及开采锡矿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华人社区对华文教育事业的赞助。

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许多华文学校因而准备接受殖民地政府附有条件的资助。可能出于自身财政上的困难,殖民地政府在金文泰总督统治下(1930—1934)取消了此项津贴,致使许多华文

[1] 《附录六:华文学校补助施行细则》,见许苏吾:《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第112~119页。

[2] 1931年马来亚地区共有881间华文学校,其中只有153间接受殖民地政府之经费资助。参阅C. O. 273/579, *Monthly Review of Chinese Affairs*, No. 19, March 1932.

[3] 有关金文泰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兼驻马钦差大臣期间对华文教育发展之压制,见古鸿廷:《金文泰总督统治下的马来亚华侨》,《东海学报》,卷32,1991年,第63~76页。

[4] Chu tse-sheng, "The Singapore Chinese Protectorate, 1900—1941,"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25, part 1, 1971, pp. 30~31.